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the Chinese-and Japanese-Rhetoric
in the Present Age with the Example Wang Xijie and Sato Nobuo

中日当代修辞学比较研究

——以王希杰和佐藤信夫为例

肖书文◎著



人民出版社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Rhetoric
in the Present Age with the Example Wang Xijie and Saito Nobuo

中日当代修辞学比较研究

——以王希杰和佐藤信夫为例

肖书文◎著



●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张伟珍

封面设计：吴燕妮

版式设计：王春峥

责任校对：张红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日当代修辞学比较研究：以王希杰和佐藤信夫为例 /

肖书文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ISBN 978-7-01-015499-2

I. ①中… II. ①肖… III. ①修辞学—研究 IV. ①H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0955 号

中日当代修辞学比较研究

ZHONGRI DANGDAI XIUCIXUE BIJIAO YANJIU

——以王希杰和佐藤信夫为例

肖书文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20.5

字数：320 千字

ISBN 978-7-01-015499-2 定价：5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
(14YJA740044)

／ 目 录 ／

引 言 /1

第一章 王希杰修辞理论述评 /19

第一节 王希杰修辞理论的思想渊源 /20

一、中西修辞学传统回顾 /20

二、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26

三、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对王希杰的影响 /45

第二节 王希杰修辞理论的体系结构 /46

一、《汉语修辞学》中的体系结构 /47

二、《修辞学新论》中的创新 /62

三、《修辞学通论》中体系结构的确立 /78

四、《修辞学导论》中向起点的复归 /87

第三节 王希杰修辞理论的总体评价 /89

一、“效果论”/89

二、“正偏离”和“负偏离”/91

三、“四个世界”说 /92

四、方法论和潜性修辞 /93

第二章 佐藤信夫修辞理论述评 /98

第一节 佐藤信夫对前人修辞学的批判 /101

一、佐藤信夫对近现代日本修辞学的批判 /101

二、佐藤信夫对西方修辞学的批判 /111

第二节 作为“第三视点”的修辞感觉 /119

一、视角的转换：对“零度”与“偏离”的颠倒 /119

二、佐藤信夫对修辞格的研究 /124

三、佐藤信夫修辞学的本体论和人性论 /134

第三节 佐藤信夫对传统修辞学的认识论改造和重建 /139

一、对西方古典修辞学的拯救 /140

二、作为创造性认识造型的辞格体系 /145

第四节 佐藤信夫修辞理论的总体评价 /180

一、修辞学的人性论 /180

二、修辞学的认识论 /182

三、修辞学的方法论 /185

第三章 王希杰与佐藤信夫修辞学比较 /189

第一节 逻辑起点的比较 /189

一、对“修辞学”的定义 /190

二、两种定义的基础 /195

第二节 体系结构的比较 /208

一、王希杰修辞学体系的层次性 /209

二、佐藤信夫修辞学体系的有机性 /212

三、两种体系的异同 /215

第三节 方法的比较 /222

- 一、对结构主义方法的两种不同运用 /222
- 二、对辩证方法的两种不同运用 /226
- 三、方法与本体的两种不同的关系 /234

第四章 中日当代修辞学理论的一般倾向比较 /244

第一节 中国当代修辞学的一般倾向：出走与回归 /245

- 一、陈望道以前或同时代的中国现代修辞学 /246
- 二、1949 年以后的中国当代修辞学 /252

第二节 日本现当代修辞学的一般倾向：拿来和超越 /267

- 一、日本现代修辞学中的“拿来” /269
- 二、日本现当代修辞学中的“超越” /278

第三节 两种倾向的比较及结论 /298

- 一、差异方面 /298
- 二、相同方面 /302
- 三、结论 /305

结 语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修辞哲学的设想 /307

参考文献 /313

后 记 /317

(一)

中日两个民族同属东方民族，并且常常被一些人归入同一个“儒家文化圈”。的确，当我们阅读关于日本文化的论著，例如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时，往往会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觉得中国人也有自己的“菊与刀”，即道家文化和儒家—法家文化。我们会觉得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差异，大概比中国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差异大不了多少。至于语言上的亲缘关系，则更是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事实。日本学者中村元认为：“日本人虽然没有舍弃他们的日语，但是当他们希望书面表达抽象的概念时，他们就不得不求助于汉字了。体现在汉字中的中国人的思想对日本人的思维形态的影响是巨大的。”^① 中村元在概括“日

^① [日] 中村元：《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林太、马小鹤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31 页。

本思想”时提出了一系列特点，如“明显的直观性和情绪性”，“喜欢单纯的、象征性的表象”，“明显的非合理主义的倾向”，“非逻辑的”，“关于客观规律的知识也很贫乏”，“现世主义的，他们企图在现象界中去把握绝对者”，“不追求超越人的东西，因而缺乏一种崇高的宗教感”等等。他还把这种思维倾向的根源归结到“重视人伦关系，肯定人伦关系相对于个人来说具有优越性，把有限的人伦组织绝对化了”，认为“这一倾向是从尊重家庭道德、重视等级身份秩序开始的，最终却导致了国家至上主义。”^① 这些说法听起来就像是在说中国的情况。事实上，我国学者揭侠教授也在其《日语修辞研究》中，对日语和汉语在修辞上的共性作了五点归纳：（1）重直觉、重感觉；（2）语言表达上的模糊性倾向；（3）重简洁，多省略；（4）俗语与比喻的通用；（5）轻逻辑分析，重情感和综合。^② 这种归纳与中村元的概括如出一辙，可以说是中日学者的共识。

然而，正如本尼迪克特在研究比较人类学时所深切体会到的：“对一个人类学家来说，研究这种在整体上具有许多共性的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是最有益的。”^③ 同样，对于一个关注中日修辞学比较的人来说，揭示这两种语言理论之间的差异也是最具有启发意义的。从历史上看，中日修辞学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基本上是日本人一边倒地学习和引进中国的修辞法，所以中日传统修辞观由于太过接近，且有一种主从关系，也就缺乏真正的可比性。按照揭侠的说法，明治以前中日修辞学要说有什么差别的话，主要就是修辞观念上的差别，即“汉语修辞有着哲学的、宏观的思想作为支撑，而日语修辞的背后缺少宏大思想的引导和支持。如

① 【日】中村元：《比较思想论》，吴震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0—171页。

② 参见揭侠：《日语修辞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38—239页。

③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7页。

汉语修辞观念强调人言相待，主张道器合一与知行合一，而日语修辞中却缺乏这样的观念。”^①因此可以说，中国古代有修辞学，而日本当时只有修辞（术）而无修辞学。不过，中国古代修辞学尽管有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作为支撑，本身却并未形成独立的系统学科理论和普遍原理，因此严格说来还不算是现代意义的、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的修辞科学（揭侠甚至不把它称之为“修辞学”，而只称之为“修辞”或“修辞观念”）。接下来揭侠又指出：

日本在明治年间先于中国引进了西方的修辞学。二战之后，日本时刻关注着西方修辞学的动向，一旦发现欧美等国有什么新的成果就马上加以吸收学习。……与之相比，中国是通过学习日本，因此也就晚于日本才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修辞学的。之后直至20世纪80年代之前，汉语修辞对西方修辞学动向的反应并不敏感，墨守成规的现象比较突出，对于西方修辞学历史和发展的介绍乃至学习借鉴缺少热情，动辄以我国“自古有之”为由避而不谈西方修辞学。相对于日语修辞在观念的更新上所显现出的好学上进，汉语修辞在观念的更新方面显得保守和消极。^②

至此，情况就完全颠倒过来了：从20世纪头20年开始，不再是日本人到中国来学习修辞，而是中国人到日本去学习由西方传来的现代修辞学。就中国这方面而言，这一过程的最具影响力的成果，就是从日本早稻田大学（当时日本修辞学研究的中心）回国的陈望道先生出版于

① 揭侠：《日语修辞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63页。

② 同上书，第263—264页。

20 世纪前期的《修辞学发凡》(1932 年)。根据陈先生在本书中的回顾,中国“五四”以后曾有过一个“中外修辞学说竞争时期”,其中西方修辞学派以唐钺的《修辞格》为代表,将汉语中各种修辞现象强纳入西方修辞学的框架中;而本土修辞学派以郑奠的《中国修辞学研究法》为代表,表达了一种复古的倾向。^① 陈氏自述他无意介入这场争论,但认为“一切科学都不能不是时代的,至少也要受时代所要求所注重,及所鄙弃所忽视的影响。何况修辞学,它的成事成例原本是日在进展的。成事成例的自身既已进展,则归纳成事成例而成的修辞学说,自然也不能不随着进展”。“我们生在现代,固然没有墨守陈例旧说的义务,可是我们实有采取古今所有成就来作我们新事业的始基的权利。”^② 实际上他是综合了两派的长处,但更为倾向于西化派的“新探”。陈氏的贡献在于,他本着对古今中外的“成事成例”及由此“归纳而成”的修辞学说兼收并蓄的原则,运用自己所积累的丰富的中外修辞学知识和由西方经过日本引入的科学方法,而首次建构起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修辞学体系。据说他在日本时,曾钻研过日本现代三大修辞学家坪内逍遙、岛村泷太郎和五十嵐力的书,^③ 而且他所建立的这个体系,按照揭侠的说法,“可以从中很容易地发现岛村影响的痕迹”。^④ 正是这本书,被称之为“现代修辞学诞生的标志”,是“中国修辞学的奠基之作”。^⑤

然而,自那以来,中国修辞学理论的发展陷入了一个近五十年的停

① 参见陈望道:《修辞学发凡》,载《陈望道文集》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514 页。

② 同上书,第 517 页。

③ 参见《〈修辞学发凡〉与中国修辞学》,复旦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 页。

④ 揭侠:《日语修辞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58 页。

⑤ 同上书,第 249 页。此说应来自于刘大白为《修辞学发凡》所写的序,称该书是“中国第一部修辞学书”,见《陈望道文集》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522 页。

滞时期，再也没有出现超过陈望道的理论创造，除个别人（如 60 年代的张弓）还在艰难探索外，总体状况是理论下移和“普及”。揭侠把这一时期称之为“普及期”：“汉语修辞学在普及期的重要特征是，汉语修辞的普及开来是伴随着政治宣传而兴起的，无论理论还是实践，其研究深度都不够。”^①实际上是对这一段汉语修辞学水平下降、缺乏理论建树的批评，也就是上面所引的“对西方修辞学动向的反应并不敏感”，“动辄以我国‘自古有之’为由避而不谈西方修辞学。相对于日语修辞在观念的更新上所显现出的好学上进，汉语修辞在观念的更新方面显得保守和消极”。其实，我国“自古有之”的修辞理论本来就有浓厚的道德政治宣教的意味，而且缺乏学科上的理论体系，所以直到 80 年代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修辞理论的政治宣传化、工具化特征不过是向固有传统的倒退而已。^②可以说，这一阶段中国修辞学在理论水平和创新性方面已经大大落后于日本。

20 世纪末中国的改革开放迎来了中国修辞学的“繁荣期”。^③揭侠说：“汉语修辞学在繁荣期的重要特征是这一时期受到了国外学术思想如结构主义语言学、功能主义语言学、语境理论、语用理论等的影响，学术研究成果斐然，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④其中首先引证的成果，还是陈望道的“语辞调整说”（也就是把修辞定义为“语辞的调整

① 《陈望道文集》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50 页。

② 这种情况在《修辞学发凡》中已有苗头，如：“我们讲话写文章给别人听别人看，便是在做宣传工作。要宣传得好，必须讲究语辞的运用。……可以说，语言是我们用来进行宣传的工具，或武器。”见上书，第 244—245 页。考虑到当时的具体情况，陈望道的这种说法是可以理解的，他也并没有按照这种公式来建立自己的修辞学。但后来的人却朝着这种片面化方向恶性发展了。

③ 这种“草创期、普及期、繁荣期”三阶段的划分可参见袁晖、宗廷虎主编：《汉语修辞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八、九章；姚亚平：《当代中国修辞学》，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7—12 页。

④ 揭侠：《日语修辞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51 页。

或适用”，而反对把修辞仅仅理解为“语辞的修饰”^①），因为据揭侠看来，“此说在学术界影响最大，影响面最广，影响的时间也最长”。当然还列举了其他如“文辞修饰说、美辞说与语言加工说”“修辞技巧、技术艺术论”“辞格中心说”“语言材料选择说或同义形式选择说”“言语形式最佳组合说”等等。^②可以看出，所有这些归类原则上都可以划归两大类，即陈望道所提出的“语辞的调整或适用”说和“语辞的修饰”说。后面我们将会指出，这两大类的对立，其实是西方古典修辞学中一直争论不休、至今也未完全统一的“说服功能”和“审美艺术功能”“雄辩术”和“诗艺”的传统对立的曲折反映，也隐约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质”之辨的影子。^③

由此可见，中国修辞学的繁荣期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高层次的“元修辞学”方面仍然没能跳出中西传统的框框，而是在既定的框架里面来进行一些具体规则的探讨。姚亚平指出，当代中国修辞学在目前已暴露出严重的缺陷，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是对修辞学的认识方面的忽视，片面追求实践效果：

修辞学长期把自己只看成是一种教人运用语言的“术”，而忽视了自己更是一门揭示语言特点和规律的“学”。其结果，一是学科发展出现畸形。修辞技巧修辞方法的归纳比比皆是，而修辞性质、特点、规律，尤其是汉语修辞的民族特点、文化内涵与人文性质却不甚了了；二是研究目的过于实用。不少修辞学者一味追求实用，常常满足于修辞术的归纳，将某种修辞效果简单地机械地对应某种修辞技术。修辞研究似乎成为江湖

① 参见陈望道：《修辞学发凡》，载《陈望道文集》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7页。

② 揭侠：《日语修辞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51页。

③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

医生开药方的活动。修辞者要达到什么目的，修辞学者就开出什么处方。三是社会评价侧重功利。人们常常认为“语法学无用却较科学，修辞学有用但不科学”。“效用”与“科学”本是统一的，这种评价值得这两门科学深思。^①

第二是忽视了修辞学的基础建设和理论建设，这与前一方面其实是一回事，因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也就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修辞学历程缺乏的正是理论上的发展，“且不说前后两个相连的历史阶段的修辞观念与理论没有多少进展，就是现在的修辞观念、理论甚至术语与半个世纪前陈望道的修辞观念、理论甚至术语在本质上与体系上也没多大区别，更为严重的是，现在的修辞学者不愿或不肯表示要有这种区别的意愿！”^②“现在，修辞研究学术品位低下、理论层次不高、理论意识不浓致使学科发展后劲不足、影响不力，已成为中国修辞学明显而突出的问题。”^③话虽然说得尖锐，但的确抓住了要害，值得我们深思。第三和第四两个方面也是前两个方面的延伸，即由于忽视理论建设，因而导致“研究者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对汉语修辞特点、结构、内涵、规律的开掘上，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基本方法没有多少变化与深化，一个劲地进行把ABC重组为BCA或ACB之类的形式游戏”，而在修辞方法上倾向于形式化和定量化，以为这就是“科学化”。再就是在学术评价上用情感代替学术，对历史的功过缺乏冷静的理性的分析。^④这些都是苦口良药。^⑤

① 姚亚平：《当代中国修辞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5页。

② 同上书，第35页。

③ 同上书，第36页。

④ 同上书，第38、40—41页。

⑤ 关于这场争论引起的各方反响，参见冯广艺：《汉语修辞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3—384页。

实际上,上述这四个方面可以归结为对修辞学的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上没有实质性的提升。也可以说,这些方面历来不是中国文化的强项,中国传统更关心的是实用的方面,包括技术实用、政治实用和审美实用;而这种“实用理性”(李泽厚语)和西方修辞学传统中的工具主义结合在一起,便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认知框架。中国当代修辞学要有实质性的理论创新和突破,全赖于是否能对这种认知框架进行深层次的反思,打破或超越这种狭隘的框架。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于中西和日本已有的修辞理论成果作全面的衡量和大胆的开拓,而不是固守成说或者仅仅埋头于经验的归纳。

至于日本修辞学近五十年来的发展则颇为惊人。应当说,在此之前,明治时期的日本人引进西方修辞学基本上都是怀着政治实用主义的目的(在这点上与中国人相似),即为当时的民主法制改革做准备,这种思潮巅峰时期的代表人物就是高田早苗以及上面提到的日本“三大修辞学家”(坪内逍遙、岛村泷太郎、五十岚力)等人。但他们所做的工作主要是移植西方修辞学到日本的土壤上来,缺乏真正的创新,因此进入大正时期,伴随着修辞学在西方的落潮,日本修辞学热便也走向了低谷,几乎无人问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民主制的确立和完善化,以及教育的普及和日常生活与国际接轨,日本修辞学才开始复兴,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日本修辞学家。揭侠在他的书中特别举出的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佐藤信夫,并对他作了最多的文字介绍:

佐藤信夫在修辞学理论探讨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如:《修辞感觉——语言开拓新的视角》(1978)、《修辞认识——语言创造新的世界》(1981)、《小议修辞》(1985)、《修辞·符号 etc》(1986)、《修辞消息》(1987)等。在《感觉》一书中,

作者回答了为什么要重视比喻的问题，指出西方修辞学的理论和体系对于新的创造性认识机制的探索、对于发现性思考的理解极其有效。并且从与语言表达关系最为密切的修辞格中选出了八个辞格，重新叩问其定义，以寻求其“发现性造型”的作用。《认识》一书是《感觉》的续篇。《小议修辞》以全新的感觉论述了修辞的功效。《修辞·符号 etc》论述了修辞与符号学的关系。而《修辞消息》则论述了修辞的历史意义与符号的修辞性。^①

我们在本书中将要指出，佐藤信夫修辞学一个最值得注意的理论取向，是他在修辞观上的革命性的创见，即把修辞学从一个单纯的表达工具（不论是“语辞的调整”工具还是“语辞的修饰”工具）提升为人性的基本生存方式，也就是建立在修辞感觉上的创造性的“认识造型”。在他看来，修辞学虽然属于语言学的范畴，但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在语言上说话的方式恰好反映出人的存在方式；而修辞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说话方式，它表现了人的存在的创造性，人眼中的整个世界都是由人的修辞方式创造性地建构起来的。正如佐藤自己所说：“语言不仅是传达思想的工具，还是使人类文化得以成立的根据。”这是一种层次很高的语言哲学和修辞哲学，它吸收了西方现代语言哲学、存在哲学、结构主义、符号学、现象学等新哲学思潮的营养，但在基本立场上超越了西方传统修辞理论的工具主义倾向，形成了他自己特有的修辞学本体论，并带有强烈的日本民族重感觉、重体验的特点。佐藤信夫的修辞学是日本当代修辞学的最高成就。

那么，反过来看，中国当代修辞学也不是没有进行过突破传统、创

① 揭侠：《日语修辞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59—260 页。

建新体系的尝试，但基本上还是在陈望道所奠定的基础上作些细节方面的扩展，而尚未产生如同佐藤信夫那样的在理论上完全独创性的成果。因此从整体状况看虽然百花齐放，各有千秋，但每朵花却并没有显出持久的生命力，无法真正开出一种新的气象来。有人指出：“《修辞学发凡》出版七十多年来，国内修辞学界更习惯于‘照着说’，而少有‘接着说’‘对着说’‘换一种思路说’的学术勇气和理论准备。”^①因此，如果我们要进行中日当代修辞学的比较，在中国修辞学方面我们就只能挑出一个相对来说影响较大、体系较全面、结构较合理的体系来，作为与日本当代修辞学的代表人物佐藤信夫相比较的个案。我们选中了王希杰的修辞学体系，正是因为在我们看来这个体系比较符合上述标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王希杰的修辞学体系在中国当代修辞学中的地位就相当于佐藤信夫修辞学在日本当代修辞学中的地位。应当说，到目前为止，国内修辞学界还没有能够被公认为具有相当于这一地位的修辞学体系，只有当年的陈望道先生曾经有过这种地位。但如果一定要在当代中国修辞学中挑出一个例子来与佐藤信夫作一横向比较的话，我们恐怕还只能挑中王希杰的体系。有人曾评价王希杰的修辞学体系说：“它的主要成就是建立了继陈望道、张弓以来的第三个修辞学体系，他的‘三一’理论（三组概念一个体系）具有很高的科学品性。”^②并且还说：“更重要的是，王希杰还能不断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永远走在学科的最前沿。这一点可以说是他的学术品格，在中国修辞学界无有出其右者。”^③又如，宗守云在《修辞学的多视角研究》一书中谈到“当代

① 谭学纯、朱玲：《修辞研究：走出技巧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序。

② 高万云：《王希杰语言学研究的整体评价》，载《中国修辞理论与批评》，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页。

③ 同上书，第332页。